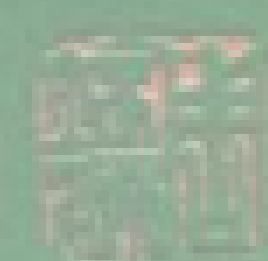


黄自遗作集

周培源



（文论分册）

安徽文艺出版社

黄自遗作集

文论分册

上海音乐学院

《黄自遗作集》编辑小组



黄 自

叔父大人尊鑒來示請悉所詢一切非常的高來示令勉而表示意見也

適值星期休業有暇茲擬筆錄出少許尚望於暇時指示意見為持全

當謂人生不僅為謀衣食住而已而欲得美術之興味也蓋斯山之所謂人生

每須貽少許之音樂讀少許之圖書冷少許之詩詞翰硃司金

人生而無工作則成罪惡之徒而若美術則為野蠻以外如托尔斯泰

康德 Kant 費希 脫 等名人咸竭其提倡美術之志

丁巳秋李清客海濱集序

美術與世界社會之文化有莫大關係之關係自歐戰告終以來美術之呼

聲愈高人生以物質為終不及精神之文明也自是美術愈古愈重要地位

泰西之人提倡獎勵者前以國容若果是於今則恒河沙數矣我國雖

步後塵如蔡子氏等亦稍提倡然其時大勢已變遷矣夫音樂者美

曲全中 非原朝

術中之一最高尚者也故托爾斯泰曰音樂能發表個人之思想其價值在

其他美術之上也音樂不僅為娛樂其功效良為愛故孫 *Dr. S. S. S.* 曰音樂

能治富人之志氣消滅其忿恨馬陸 *Marcella* 曰音樂之目的在使人格高

尚而已薩馬雷 *Shackley* 曰音樂不過止其功效最量能動人友愛和平之心

丁巳九秋季清名海濱集字

此常人所不能故暴躁之人而習音樂則性力改為溫和多慈之人而習音樂

則此乃後悅樂也此人所共知也惟市廣之音樂多生僻學心凡學以及人聲

社會俱有極大之關係中國之於音樂今雖漸以廢弛及乎古代亦不一種

問孔門六藝樂居次但此外如周公等大賢心頗重視之可見粵海中外亦通古今

音樂者有用之學也昔余仲若觀夫夫自物質文明之所形淘汰生產能力自不日有

是此但印信亦即此後實但吾人之求學人不能僅此點入眼因今日各種

學問除實業之外更覺他失教育也諸君非是之學問也亦非是之

產能力為標準則人將從事實業教育以治世界之憂嘆願矣至於此意

之有傷也丁巳九秋實業之罪也乃其國人自誤用之耳清客海濱集德國在歐戰以前在教育有

實業在軍中保衛是年一措而其國之音樂亦概半耳羅馬古之美術中

爾時歐主振圖之大者所罕有利音樂在能使國者靡之於夫夫注意之不振乃由

書國人用之不若耳夫醫藥及以療病然亦足以殺人刀操足以自衛亦足以傷

身定其利害在視其用耳書吾耳天下之物也然也望能音樂美術而已哉

故設使教育者以知音樂為名政治家不知利於皮實業家不知營利肥已則必將

注意之誤用蓋藝術之研究實業者深餘自好之意耳其於功課不

敢廢弛也其有付官事於東日夫天氣甚冷溫度總在冰點下今日將至十二度

丁巳九秋季清客海濱集字

河下後往水條後東浦以敬請

其

自漢上

三月四日

A letter to friend discussing some
of French tests in harmony.

Cheshire, C.
March 21, '28

Dear Jack,

It was with much joy and ^{very} eagerness
that I read your letter of 8th inst. in which
you tell me of your plan of going to France
this summer, for further study. I am sure
it will be a very profitable year to you
and I wish I could go also.

I am taking, this year, a course in
"harmony teaching" but devote a part of our
time to examine different tests on the sub-
ject. Recently, I came across a number of
French books. Most of which are written
by Professors of the Conservatoire - and
approach the subject of harmony from a slightly
different angle from those taken by American
and English theorists. I am ^{not} sure whether
you are already acquainted with these books
or not. At the risk of being superfluous
I shall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them.

One book which particularly especially
interests me are Lesigne's "Collection compléte
des Leçons d'harmonie" and Chapuis's "Leçons
d'harmonie". These "Leçons" - a peculiar
feature of the French - are merely a
collec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exercises
and their solutions. They contain no explanation
of the subject.

《与友人论法文版和声教材书》

一、關於學校之地位
 二、關於學校之組織
 三、關於學校之經費
 四、關於學校之教學
 五、關於學校之學生
 六、關於學校之畢業
 七、關於學校之附屬
 八、關於學校之其他

《关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改制的计划草案》

三) 本村學堂之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四) 普通學堂之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五) 普通學堂之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六) 普通學堂之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七) 普通學堂之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生徒之數目之理由

总 序

贺绿汀

“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这话本来是胡适说的，后人就拿它作为批判胡适的一种贬词。其实这话的本身也不见得完全不对。对于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甚至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可不可以“大胆设想”、或者说大胆幻想一番呢？当然可以。科学家如果没有幻想，就不可能有所成就。比如设想人可以登上月球，后来人果然登上了月球，于是幻想变成了现实。

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人物，如果不从客观事实出发，全凭主观愿望，把一个人捧上天，把另一个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后果就会不堪设想了。像黄自这个人，他在历史上到底是有功，还是有罪呢？你当然可以“大胆设想”，“设想”黄自是“蒋介石的同盟军”，或者是“国民党的御用音乐家”、“反共吹鼓手”，等等。可是你就不敢真正“小心求证”，你一证，把真正事实证出来之后，就只能证明这是对黄自的诬陷！

“文革”初期，张春桥有一次问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钟望阳：“你们那个学校是谁在领导呀？”钟望阳回答说：“是党在领导嘛！”张春桥听了大不以为然，摇了摇头说：“不是的，是黄自在领导！”

那时黄自死后快三十年了，居然“阴魂不散”，还有那么大的能耐，在九泉之下继续“领导”解放后的上海音乐学院，他当然是“罪人”，是国民党的“反共吹鼓手”了。谁还敢说个“不”字？！“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这是戈培尔的哲学。中国也有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于是黄自活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从30年代起，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老上海音专就得了一个骂名，叫做“学院派”，一直骂到现在，愈骂愈出名。只要一讲“学院派”就知道是指上海音乐学院，那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学校”，是“洋奴”。

1952年，曾有人公开写文章，说：“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几乎有三十年是在买办资产阶级的方针指导下，走着一条唯西洋音乐最崇高的错误道路，结果许多创作人才被窒灭了，被断送了，这应该成为大家痛切的教训”。可见张春桥说的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1957年“反右”，又说上海音乐界是半月天，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要把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于是派人夺了权，把一大批人打成右派。后来又出了一部电影，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把老上海音专隐喻为国民党的文化特务机关，不择手段地排斥一切左翼的抗日爱国人士；把黄自说成是和国民党的权贵勾勾搭搭，打得火热，甚至为他们炮制粉饰太平的反动歌曲，

与左翼进步文艺争地盘的御用音乐家。这显然是伪造！

现在应该清楚了。上海音乐学院从解放前不过百余人的老音专发展成为今天拥有千余人的规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成为全国音乐团体、音乐院校的重要骨干，而且其中一些人还在历次国内、国际的各种音乐比赛中不断获得大奖。这固然是由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是试问，如果没有萧友梅、黄自在国民党统治的困难条件下惨淡经营，奠定基础，上海音乐学院能有今天吗？现在国内外一些有相当修养、甚至还担负着一定领导职务的老一辈音乐界人士，难道不是大都与老上海音专有过直接、间接的联系吗？那些长期以来无休止地污蔑上海音乐学院和老音专以及萧友梅、黄自的人，无论在国内外都是不得人心的。

历史不容伪造，30年代，由于欧洲战争等原因，不少外国音乐家来到了上海。当时老上海音专的教师，绝大部分就是欧洲来的高水平的音乐家，学校的学制也参照音乐学院的标准。一个那么小的学校就有那么多高水平的外籍教授，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他们对于造就我们自己的专业音乐人才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煞的。

上海音专是经过萧友梅多方奔走呼吁，最后由于蔡元培、杨杏佛的鼎力支持，请得每月三五千元的经费才勉强办成的。萧友梅把经费中的绝大部分都用来聘请外籍教授和付房租，中国教授也是要有真才实学的。其创业之艰苦，可想而知。学校规模虽小，但实质上是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摇篮，这一点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黄自比我小一岁，可是他是我的老师。他是第一个系统地、全面地向国内学子传授欧美近代专业作曲技术理论，并且有着建立中国民族乐派的抱负的音乐教育家。没有黄自先生教导，我在音乐创作上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这一点应该是所有受过他的教导的老一辈音乐工作者都有深切体会的。

他早年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又到美国欧柏林、耶鲁两所高等音乐学府深造，以品学兼优被选为美国优秀大学生的全国性荣誉组织——法·培德·嘉派学会的会员，并先后获文学、音乐两个学士的学位。回国时虽然还只有二十五岁，但已学识渊博。在上海音专当教务主任，又包揽了理论作曲组全部专业课目的教学，达十一门之多。工作量如比繁重，教学上却一丝不苟。平日对学生谦虚诚恳，和蔼可亲，不但诲人不倦，而且关心学生疾苦，经常以自己的薪金主动资助困难的学生缴学费。黄自为建设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培育我国专业音乐人才，可以说是忠心耿耿，死而后已。他的不幸早逝，应该值得后代人深切怀念。

作为一位作曲家，他的创作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他留学美国的毕业作品——管弦乐序曲《怀旧》，是我国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也是最早在外国演出的一部中国交响音乐作品，首演时被美国报纸评为那次音乐会节目中的“佼佼者”。他为左翼进步影片《都市风光》写的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称得上是创作、并且具有专业水平的片头音

乐。这两部作品都是具有历史价值的。由他自己作词的《抗敌歌》与韦瀚章作词的《旗正飘飘》充满了爱国热情,是我国最早的两首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歌曲。他的一些艺术歌曲如《思乡》、《玫瑰三愿》、《花非花》等,形象鲜明,感情细腻,意境含蓄,词与曲、旋律与伴奏的结合都有艺术上独到之处,至今还在音乐会上演出,有的还被来华访问的外国著名歌唱家选为独唱曲目。他的《长恨歌》是我国最早、最成功的清唱剧。结构严谨,表情深刻,真挚动人;特别是其中的《山在虚无缥缈间》,是用近代专业作曲技巧创作的、纯粹中国民族风格的合唱曲的典范。后代音乐工作者可以从分析研究他的作品中获得教益,解决创作上的许多具体困难。

在理论研究上,黄自也颇有建树。他一生著述甚多,早在欧柏林求学期间用英文写作的专题论文《和声教学法札记》,就已显示他在这方面的修养。回国后他又写了《勃拉姆斯》、《乐评丛话》、《调性的表情》、《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等相当有见地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在当时不可多得,即使在今天,它们的学术价值也并未因时光流逝而有所褪色。特别是他生前已经动笔,并且打算集中时间,专心致志地完成的两部酝酿已久的中外音乐史稿,其史料之翔实、构思之缜密、规模之宏伟、工程之繁复,在当时国内音乐界都有罕见的。可惜天不假年,未竟其志,使人长叹。

黄自做事,非常认真仔细,生前就曾陆续把他的手稿逐件精工缮写,装订成册。去世后,他的亲属、知交和门生也曾在报上发表启事,呼吁由社会资助,成立“黄自先生著作出版基金会”这类的民间组织,促成这些手稿早日付梓。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以后,由于八年离乱,原来保存完善的遗稿已陆续有所损坏或流散。特别是十年浩劫,黄自的遗稿更属在劫难逃:有的在“横扫一切”时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有的则被采取“革命行动”的“红卫兵小将”亲手撕毁。总之,损失惨重,令人痛心疾首。

现经黄自夫人汪颐年先生及其长公子黄德音同志多方提供,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有关部门大力配合,代为复制黄自留美资料的美籍华裔音乐学者韩国镛教授热必襄助,由上海音乐学院《黄自遗作集》编辑小组收集、整理、编辑,特别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慨然允诺,这部《黄自遗作集》才得以出版,与读者见面。这不仅是对黄自先生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后代音乐工作者的一个宝贵的贡献,因为它为研究黄自,提供了一部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最有权威性的史料。谨此代表读者们衷心感谢。

1984. 11. 17. 上海

文 论 分 册 序

这是《黄自遗作集》的第一分册，内容是黄自先生遗作中的文章部分。黄先生天性勤奋，于教学、作曲之外，写过许多文章，但因过去没有注意收集和保存，还有各种客观原因，以致严重散失，现在收集起来极不容易。有许多著作已经无法找到了，十分可惜！目前这分册所包含的若干篇文章——书信、论文、序言、讲话以及教材等，都是由人手极少的编辑小组同志们费了很大的精力收集而成的。其中有黄先生学生时代的三封信尤为难得。希望今后能陆续有所发现，可于再版时补充编入。

一个人的思想常常会跟着时间和环境的转移而转移，评论一个人的思想要抓住他的主流。在五四运动以后各种艺术思潮中，黄先生的思想的主流，是主张音乐的作用应该是美化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道德。这种思想在本分册中到处都可以发现。例如他在《西洋音乐进化史鸟瞰》一文中说：“艺术是生活的表示”；在同一文中又说：“浪漫运动无非是当时生活、思想的产物”。他在早期写给叔父的信中说：“推而广之，音乐与生理学、心理学以及人群社会具有极大关系……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音乐为有用之学问也，明若观火矣”。他在《音乐欣赏》中写道：“中外古今的学者都认音乐有极大感动与教化人的力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达尔文少时，很喜欢音乐；中年潜心研究科学，无暇及此。对于音乐的兴趣便渐渐减少。晚年他很后悔，因为他觉得生活没有艺术的调剂，便十分枯燥，而智慧和道德都受了极大的损害。”他多次引用歌德的话“人生每日须聆少许之音乐，读少许之图画，吟少许之诗歌……”。从这些文章中都可看到，黄先生显然是主张音乐是要服务于人生，为人民生活谋利益的。

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中、西音乐关系的问题，黄先生在《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一文中写道：“一部分的人以为旧乐是不可雕之朽木，须整个儿的打倒，而以西乐代之，这些人的错误是在没有认清凡是伟大的艺术都不失为民族与社会的写照。旧乐与民谣中流露的特质，也就是我们民族性的表现，那么当然是不容一笔抹煞的。”又说“就是西洋音乐，并不是全是好的。我们须严加选择，那些坏的，我们应当排斥，而好的暂时不妨多多借重。总之，我们现在所要的是学西洋好的音乐的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与民谣……”。黄先生这篇文章的这些论点，我看是符合于“洋为中用”的原则的。

黄先生治学的精神非常严肃认真。例如他写《勃拉姆斯》这篇文章，参考了别人的著作达三十一一种之多，其中包括一些平常不大为人注意的著作。但他并不是抄袭别人的作品据为己有，而是围绕着自己的见解，广泛引证别人的看法，以极有层次，易读好懂的笔法，导致一个不偏不倚的结论：“复调音乐到了巴赫已经登峰造极；主调音乐的结构到了贝多芬也已莅止境。但勃拉姆斯能熔冶两者于一炉，复将浪漫派的精神灌输在古典派的躯壳中，而产生一种新的艺术。我人虽不能附和皮罗承认巴赫、贝多芬与勃拉姆斯是鼎足而三的音坛台柱，但同时也决不能否认他是步两人之后，贯通古典、浪漫两大潮流的一位大师。”黄先生的这篇论文逻辑性强，说服力大，深入浅出，笔法生动，至今仍不失为中外论勃拉姆斯的文献中罕见的佳作。

黄自先生是当时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教授兼教务主任。但他并没忽视音乐的普及工作，他很关心中、小学校的音乐教育，亲自编写教科书。他也很关心一般群众的音乐知识和欣赏，为此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编写了大量的文字。这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另一方面。

一九三七年黄先生为了专心致力于教学、创作和著述，辞去了工作繁重的教务主任职务，专门从事教学。萧友梅校长聘我继黄先生为教务主任。我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由广州来到上海，这时已是芦沟桥事变之后，战事已逼近上海。八月二日，音专由江湾迁入租界，以避可能发生的战火。学校在租界中颠沛流离，化整为零，一年中迁校四次。一九三八年夏，黄先生得了伤寒，一病不起，竟在他三十四岁风华正茂之年与世长辞了！我与黄先生共事仅一年，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刻的。他学问渊博，教导有方，深得全校师生的敬重；而为人诚恳，虚心谦逊，尤为令人难忘。正如他在《勃拉姆斯》一文中说：“伟人都是谦逊的”，我相信他一定是经常以这句话作为他的座右铭的。今《黄自遗作集》出版，编辑小组嘱我为文论分册作序，我追溯往事，不胜感慨。同时觉得出版这个遗作集不但于纪念黄先生实属必要，而且使黄先生的作品留传下去，以便后辈从中吸取教益，并藉以了解当时音乐界的一些思想情况，都是很有好处的。

陈 洪

一九八四年九月于南京师大

分 册 说 明

本分册包括黄自作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六年间的书信、文章、序言、讲话稿和其他文稿共二十三篇。其中十七篇为散见于抗战前各有关书报杂志的出版物；五篇为未发表的手稿；一篇为《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中的七十二讲音乐欣赏课文，收入时，对内容相同的部分课文进行了调整，分别合并为文中的一节（如“中古音乐”原为四课，现合并为一节，等等），并将各课的标题作为文中各节的小标题。

黄自的重要文章，至少尚有以下三篇：一九三五年四月为汉口电台所作音乐欣赏常识广播稿；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在上海举行的王光祈先生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说词；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在中央文化设计委员会所设音乐研究会上所提出的“关于社会音乐的意见”的议案。其中第一篇的手稿原存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资料室，“文革”后突然不知去向，另两篇也尚未见到手稿或出版物，因此不能收入。寻查工作，我们将继续进行，我们切望热心的读者提供线索，特别是我们尚未发现的黄自文论的线索。

黄自还为学校授课和电台广播写过一些乐曲简释或音乐比赛条例等文稿，有的也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因不属于文论，又不能独立成篇，故不收入。

凡收入本分册的各篇，均按文体归类，在各类中再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序。所有篇目的出处均见题注，凡由我们代拟的篇名或写作时间不详者，也均在题注中作了说明。

为了保持原作的面貌，我们在内容上一律不作增删。校勘时，仅对未标点的手稿进行了标点。对业已发现的手稿中的漏字、笔误以及出版物中漏排、错排之处作了补正或更改，有的并用方括号〔 〕标出。

原作中引用外文有英文，有德文，有法文，有意大利文；有时只用外文，有时只用译名，有时外文与译名并用；所用译名与目前通用译名又不同，对于上述情况，我们也一律不作改动。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另列“外文译名对照表”附于后。其中外文统一按字母顺序排列。

我们除保留作者自注外，还就生僻字和典故、某些未注明出处的引文以及重要的人名、乐语等作了简注，并对作者的某些自注作了补充注释。作者自注及我们的补充注释分别用“原注”及“编注”标明，排在页下；新增加的简注附后。

戴鹏海

1985年5月28日